

答刘崇顺同志

张 琢

70年前，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问世的时候，他在《呐喊·自序》中回顾了自己文字问世以来的一段体验，他写道：“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于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比较起来，我要算是很幸运的了。拙著《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出版不到一年，即见到了全国各报刊10余种关于该书的书评、书讯、书摘和更多的相识的、不相识的朋友和读者的热情来信。刘崇顺同志甚至在未及看到我的这本书时，就表示要同我商榷了——今年4月初在深圳小梅沙举行的“’93中国社会学学会‘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研讨会”期间，崇顺同志就向我面教了他要同我“商榷”的一些观点。我为其热情所感，同时对他要“商榷”的内容也有些诧异——感到与我书中的观点不对号。直白地说，就是感到是些先入之见。为了求得崇顺同志更准确的指教，回京后便遵命寄上了一本拙著。不久即收到了崇顺同志的上文《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机遇及其他——张琢同志‘九死一生’理论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展开一阅，商榷意见基本上仍与在“通览”拙著之前所谈的差不多。同时指名要“就教”于我“和学术界的朋友”。“来而无往非礼也”，我也就不能不答了。下面，就《初探》所示，简复两点。

一、“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和历史必然性”

《初探》说：“‘九死一生’理论在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的理性思考之中，包含着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历史机遇多次丧失的痛惜之情。这种痛惜之情是许多学者和爱国志士所共有的。这种痛惜之情的潜台词是：中国本来早就可以走上现代化的振兴之路的，只是因为因为没有抓住‘天赐良机’，才使国家民族积贫渐弱，落后于人，由此生出‘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无限感慨。这种感慨显然是把丧失机遇归因于主体意志及主体的动机、观念、心态等等主观因素。”

这段“潜台词”及其中表述的“感慨”系《初探》作者杜撰出来的批评对象，《九死一生》及我的其他著作中既没有这样的意思，也没有这样的语言（包括“潜台词”中加引号的“天赐良机”、“一失足成千古恨”云云，在《九死一生》中也是找不到的）——某虽不才，但也不至于唯心到如此地步。相反，《九死一生》开宗明义，在《序言》中一开头就写道：

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各国、各地区有着共同的规律性。同时，由于各国、各地区现代化起步和发展的时代条件不同，各国的领土、自然条件

和人口等结构要素的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性质的不同,而显示出各不相同的发展特征。我们对各种模式的现代化的内容只能辩证地把握其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现代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了科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

在具体进入到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的分析时,该书也首先指出了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受到强烈的外铄影响,但它又是以中国自在的地理环境、中国各方面的历史积累为基础展开的。中国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特质是决定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点的前提条件。这个自然—历史前提是由下列基本要素构成的:

地理环境、民族和人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制度、历史过程和文化传统等。其中每一要素又包含若干子系统。所有构成人类—环境系统的诸因素都不是孤立存在、各各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交互作用,天作与人为在不期然与期然中成就了历史的巨大系统工程——当然,归根到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第1页)这还怎么只是单凭主观意志的选择呢?

《九死一生》提出并分析了自13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现代化发展的9次受挫和失机,都是从主客观多方面因素并以当时世界历史的发展为背景进行比较分析的。《初探》甚至紧接上面那段“潜台词”也说:“‘九死一生’理论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特点及其曲折进程所作的许多精辟分析,恰恰说明了这种历史必然性。例如,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地域转移(空间断层)和历史阻隔(时间断层),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点等等,无不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现代化运动屡遭挫折、屡难启动的内在原因。”既如此,那怎么又“只是因为没有抓住‘天赐良机’”,“把丧失机遇归因于主体意志及主体的动机、观念、心态等等主观因素”呢?“潜台词”,“潜”在哪里?

不过,与《初探》作者不同的是,我确实不仅首先分析了客观条件决定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注意到了社会过程与自然过程的差别——人是有意识的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性”正是通过人(个人、群体)和人们的社会组织(政党、国家、军队及其他各种社团)的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即人是社会历史借以实现的活载体。因此,对历史过程的认识便离不开对人的行为和意识的分析。而且,离开了对人类自身的实践和认识的历史分析,也无从了解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丰富内容。所以,在社会历史的分析中,既要防止落入唯心论的陷阱,也要注意避免机械决定论,要把握好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并通过偶然性体现出来,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中国从零星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到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现代化从潜要素的孕育到正式启动及其后的发展,都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其间包括多次受挫)。对不同时期的萌芽程度及其主要表现、受挫情况和原因,我在篇幅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做了扼要的具体分析和历史比较,并没有等量齐观,不能简单地归之为“相提并论”。

二、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潜要素”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

在分析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现代化过程时,我很感谢《初探》作者注意到了拙著所使用的“现代化发展的潜要素”的概念及其界定。但是《初探》作者却似乎疏忽了拙著对“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与“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区别。这一区别的发言权不在我,我在《九死一生》中已作了交待。已故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在198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概

论》中提出“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结构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因素”并强调，“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出现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与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两回事，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的一些历史前提条件，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是资本主义萌芽本身。”^①在我自己的分析中是把“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包括在“现代化发展的潜要素”中的。（见第二章目录及内容便可了然）

不过，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的分析，或者是对“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分析，或者是对“现代化发展的潜要素”的分析，我都不同意仅把它们看作是“超历史”、“超时代”的“单一要素”而偶然发生的。如，关于战国时代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产生的条件和表现，根据史料和傅筑夫等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我在《九死一生》中就归纳出了八个方面（第44—53页）；关于“宋代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则主要参考了著名宋史专家漆侠的《宋代经济史》^②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其它史料，就宋代的科技、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商业、金融、城市发展及社会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综合分析，才得出结论：“综上所述，宋代在科技、经济和部分市民生活中，确已出现了明显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但是从总体上看，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观念上根植于农业自然经济的封建宗法制度仍然占着统治地位。”（第65—73页）因此，我不能同意《初探》作者对我的“现代化发展的潜要素”作的超时代的抽象的孤立的“理解”。

至于《初探》作者所说：“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学术界通常认为应在明代末期。这一观点虽不能说是定论，但至少是早已形成了广泛共识的。本文寥寥，对此不能详加论列。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可以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限上溯到宋元之际的话，也就可以上溯到唐代、汉代以至战国时代。如果说上溯到汉唐时代不妥，那么，上溯到宋元之际同样缺乏令人信服的足够证据”。我也不同意这样任意地“上溯”。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起始的时间和断断续续、曲折发展的过程，我在《九死一生》中已花了整整一章（第二章）近7万字占全书近四分之一篇幅（第40—123页）介绍了对各个时期的各种“萌芽说”的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论著，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参考的文献在千万字以上，主要参考书目已附书后。其中不仅包含有《初探》作者所说“早已形成了广泛共识的”的代表性旧著，更有体现史学界、尤其经济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新的资料发现、整理、分析和新观点）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主要著作，如傅筑夫著五卷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1981—1989年）、漆侠著两卷本《宋代经济史》（1988年）、许涤新和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1985年；第二卷，1990年）以及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下册，1989年）等。这些都已可称洋洋大观，我读来是有收获、受启发的。我的书中也引用了其中的资料和观点。我不仅没有否定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说，而且以全章最大的篇幅辟专节《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挫折》进行了分析（第76—100页）。至于宋代，我在书目和专节分析中使用的标题是《宋代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但在序言中也称其为“资本主义萌芽”，反映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基本上倾向于“宋代资本主义因素萌芽”说，但也不排斥“宋代资本主义萌芽”说，更未敢轻易“定论”。现在可以借此再补充一句，可以把宋代看作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转折时期，也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①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0页；张啄：《九死一生》，第44页。

②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进向资本主义萌芽的过渡期或演变期。这自然也不是“定论”，而还须做更深入扎实的研究。作为系统研究工程，还须多方面的专家研究。从现实的研究状况看，经济史专家、历史学家和思想文化史方面的专家也许比我们幼稚的社会学方面的学者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恕我孤陋寡闻，在我们社会学同仁之中，我还未见专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力著问世。但各种观点，还是见过一些的，顺手拈来一条，就是北京大学孙立平同志最近在本刊编辑部召开的“现今我国社会结构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

人们在讲中国传统社会时，习惯上总讲两千年长期延续不断，实际上两千年是个非常笼统的概念，两千年中间曾经发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变化，这就是以宋为标志，甚至国外研究中国现代化是什么时期开始的，他们认为从宋和明这两个时期。究竟这种变化在什么地方？主要是中间层的变化。宋以前贵族地主集团的存在，由宋以后的士绅地主代替了贵族地主，士绅地主与贵族地主的特点非常不同。这一变化导致了皇权、职业官僚系统等的变化。^①

对这些新观点，不必大惊小怪，固守陈说，我以为学术上也要有吐故纳新的精神。鲁迅先生的“不默守，不荒唐”的治学原则，可作为我们的座右铭。他还说，大胆与荒唐只隔着一层纸。因此，我没有，也不赞成对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与资本主义萌芽不加区分，甚至任意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上溯上去。

总之，我以为，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讨论中，都要力求实事求是，切忌主观片面性，或任意夸张，辩证法和科学的硬功夫就在掌握好一个度。此话易说难做，让我们共勉吧。

1993年8月编后

责任编辑：唐 军

① 《“现今我国社会结构研究”座谈会综述》，《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第5页。